

過渡

葡萄牙在澳門的政治過渡及其在珠江地區的區域一體化中的表現^{*}

Moisés Silva Fernandes **

“儘管我們在澳門呆了四個多世紀，但我們在那裏留下的東西卻很少。”¹

人們普遍認為，甚至幾乎是一致地認為，在澳門回歸中國的過渡進程中，幾乎一直未出現任何衝突，這與香港的情況形成鮮明對照，那裏的政治過渡進程總是衝突不斷。對於這一事實，我們可以用下列三個因素來加以解釋。首先是因為葡萄牙的利益無論在澳門還是在珠江地區不是極小，也是很小的。其次是由於歷史原因，因為中國和葡萄牙兩國政府對澳門的政策，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四九年成立以來，就基本上一直是從極其務實的態度出發的，是建立在現實主義之基礎上的。第三，則是出於某些政治及外交因素的考慮，這令到葡萄牙政府實行一種強調雙方合作的對外政策，其目的在於使澳門的過渡進程與香港的充滿衝突的過渡進程不可思議地劃清界限，並進而在國際外交史冊上象徵性地保障一個事實上區別於臨近的香港英國殖民地的政治實體。根據上述這三個前提，我們預測澳門在其過渡期的最後幾年中仍將是十分平靜的。

葡萄牙在澳門及珠江地區的利益甚微

葡萄牙在澳門和珠江地區以及在幅員廣大的中國（包括大陸中國、福摩薩和香港）的利益都是微乎其微的。然而，二十年前的情況卻迥然不同。因為，一九七四年

* 本文是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八日於澳門“過渡期中的澳門與其鄰近地區”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 加拿大馬尼托巴大學助理教授

1. 賈達林（Pedro Catari no）：“聯合聲明及其在中葡外交關係中的重要性”，《葡萄牙文化國際學會會刊》，第17期，（1997年），第32頁。

四月二十五日之前，葡萄牙根據其當時實施的海外政策，它在澳門的利益是高度政治性的，因而它在那裏的經濟利益和商業利益也是舉足輕重的。正如自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零年曾擔任過葡萄牙駐廣州領事的若澤·卡爾韋特·德·馬加良斯（José Calvet de Magalhães）先生所說：

“我們目前在中國的利益基本上僅限於維持葡國在澳門殖民地的主權和它的福祉。英國的立場與我們的不同，他們不僅要保護其香港殖民地，還要維護其在中國的利益……”²

薩拉查（Oliveira Salazar）領導的歷屆政府，根據葡萄牙堅決維護其海外統治的民族主義政策，於五十年代制定了一些推動經濟發展的計劃，六十年代還建立了所謂的“葡國經濟空間”（Espaço Económico Português）。前者旨在促進澳門經濟及工業的發展，後者是為了使這塊飛地在經濟上與葡萄牙一體化。幾年前，澳門大學的幾位教師進行了一項研究，他們認為葡萄牙帝國的經濟一體化政策對澳門這塊飛地的經濟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澳門經濟從最初由葡萄牙推動，由紡織業及製衣工業起步到最後的多元化發展的四個階段中³，第二階段是關鍵，它不僅取代了工業化第一階段的傳統產品之生產製造，而且大大地促進了澳門與葡萄牙在非洲的其它殖民地之間的貿易往來的巨大發展。這一形勢甚至引起了阿爾及利亞領導人本·貝拉（Ben Bella）的注意。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當時的中國總理周恩來訪問那個國家時，他曾向到訪的客人表示了這一關注⁴。

然而，隨著一九七四年“4·25”運動的發生，以及葡萄牙海外統治非殖民地化進程的飛速發展，葡萄牙感到已經沒有什麼政治理由令到自己繼續呆在澳門和珠江地區了，甚至感到在那裏繼續呆下去已經沒有什麼意思了。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葡萄牙撤走在澳門的駐軍充分說明了這一新的政治現實。除此之外，以前建立的“葡國經濟空間”也在這個時期迅速消失，從而導致葡萄牙在澳門的經濟、貿易及金融利益的消失。不過，對於這一真空，之後就再也沒有任何葡萄牙的私營經濟集團來填補了，因為這些私營經濟集團繼國內的政治動蕩以後，於七十年代中期就都被國有化了。

這樣一來，一些重要的領域，如投資領域、外貿領域及葡萄牙語言及文化教育領域等，都陷入了衰退的困境之中。比如，葡萄牙近二十年來在澳門的投資實際上等於零。該地區的葡萄牙行政領導人意識到這一現實的嚴重性，於是在八十年代後期及九十年代的前五年，對幾項重大工程進行了投資，他們的這一舉措得到中國中央政府的

2. José Calvet de Magalhães: “澳門與中國南方的政治利益”，葡萄牙駐廣州領事關於一九四七年之年度內部報告，廣州和里斯本：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1948年，第91 - 92頁。

3. Sit, V. F. S. L. Wong和R. D. Cremer: 《澳門的廠商和公司：工業發展研究》（Entrepreneurs and Enterprises in Macau: A Study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91年。

4. Moisés Silva Fernandes: 《澳門在中葡關係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從太平洋戰爭結束到1995年的年代大事記、文件、附錄和主要參考書目》，溫尼伯（加拿大），1996年，第74頁，（該作品尚未發表）。

支持。不過，參與這些投資活動的葡萄牙公司的數目很少⁵。出現這一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葡萄牙公司在國際上的投射力極其薄弱，他們不熟悉東方的現實，他們缺乏資本，缺乏企業的能動精神；在澳門的一些葡資公司，儘管與本地的知名華人領袖或大陸中國有密切的聯系，但缺少人材資源，缺少競爭能力。正如彭慕志（Jorge Morbey）所說：

“……已經宣佈要來進行投資的，不是遲來，就是又改變主意，宣布放棄了。然而，每當有一家或兩家公司來參與本澳公司的資本投資，澳門政府就總是在價格方面給予他們各種優惠條件，這在華人社會中引起種種反響。輿論指出，政府向他們提供的這些優惠低於公道的價格。這樣的資本參與令到本地的事業蒙受損失，獲利的只能是來自外面的葡國人，而本地的投資者則勢必受到歧視。我不認為這種作法會為我們帶來巨大的成功。”⁶

葡萄牙的投資不僅在澳門很少，——儘管這塊飛地上的葡萄牙政府為其提供了巨大的機會；而且在中國也很少，——儘管有一些舉足輕重的政府機構對此給予大力支持。一份關於葡萄牙同中國之間的貿易與金融關係的研究成果透露，一九九三年葡萄牙在中國沒有任何投資，一九九四年的投資額也微不足道，只有一萬康托⁷，儘管葡萄牙政府為促進葡萄牙的投資和出口早在一九九三年三月就開闢了一條高達兩億美元的信貸線⁸，並且於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六日還在北京開設了葡萄牙投資、貿易及旅遊辦事處，以支持葡萄牙企業⁹。然而，根據里斯本周刊《快報》的一篇報道，到一九九四年六月，“還沒有用完這條信貸線之額定的百分之一”，而且只有兩家跨國集團公司的子公司提出了希望使用這條信貸線的要求¹⁰。

5. Luís Cunha: “葡萄牙在澳門的公司：東方的魅力”，《澳門》，第一部分，第21期，（1990年3月），第32頁。

6. 彭慕志（Jorge Morbey）：《澳門，1999年：過渡期的挑戰》，里斯本，作者出版社，1990年，第27頁。與此一致的觀點，請參閱Peter Wise的論著：“殖民地戰場：葡萄牙為總督的下台而制定的政策”（Colonial Battleground: Portuguese Politics Blamed for Governor's Fall），《遠東經濟評論》，（1990年10月11日），第12頁；還請參閱 S.Yee和Sonny S. H. Lo（澳門大學的兩位教師）的論著：“過渡期中的澳門：非殖民地化政策”（“Macau in Transition: The Politics of Decolonization”），《亞洲研究》，第31卷，第10期，（1991年10月），第911-912頁。

7. J. M. Amado da Silva和Marília Pedroso: “中國在亞洲環境中的發展（Ⅲ）”，《經濟快報》，（1995年9月23日），第11頁。這兩位作者1995年9月份在《經濟快報》上發表的四篇文章是葡萄牙當時的工業能源部研究及計劃辦公室、葡萄牙天主教大學應用研究中心以及葡中工商協會共同研究的成果，總題目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亞洲市場上的發展和它同葡萄牙進行技術、工業和能源合作的動機”。

8. Luís Tibério: “法里亞·德·奧利維拉在北京：等待中國的‘生意’”，《經濟快報》，（1993年3月20日）第C20頁。

9. 該資料由葡萄牙駐北京大使館慷慨提供。

10. Jorge Fiel: “現仍然主要刮東風：雖然葡萄牙同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仍處於起始階段，但貿易的天平已向北京傾斜”，《私家快報》，（1994年6月4日），第6頁。

葡萄牙同幅員廣大的中國（包括大陸中國、福摩薩和香港）在貿易往來方面的形勢與上述情況也大體一致。根據一九九四年報刊上所發表的資料，葡萄牙那一年從中國的進口只佔其進口總額的百分之四點八，葡萄牙對中國的出口只佔其出口總額的百分之二點二二。下一年，即一九九四年，它從中國的進口額下降到了百分之三點七二，它對那個國家的出口額下降到了百分之二點一二¹¹。這一可憐的貿易往來狀況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即葡萄牙的對外貿易從六十年代起就已經基本上集中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CDE）的成員國家中了。一九九四年它對這些國家的出口已達其出口總額的百分之九十，它從這些國家的進口已達其進口總額的百分之八十四¹²。

然而，除了葡萄牙在澳門和中國缺乏經濟、金融及商業利益之外，還有一個使葡萄牙的利益在澳門耗盡的最重要的原因，這就是：葡萄牙的語言和文化在這塊飛地上的存在顯然極其薄弱。現有的著述表明，只有極少數華人能用葡萄牙語溝通，或者感到自己與葡國文化有關¹³。這一狀況已得到一個專家研討會的公認，他們的結論是：

“關於這一點，我們認為，葡萄牙語沒有在這個地區的特色中享有作為一種有影響的語言的地位，〔……〕人們發現，在這個地區的絕大多數的學校中，即所有的私立學校中，都存在着實施各種既定政策的障礙；另一方面，這裡的教師中認為自己與葡萄牙文化有關係的人數極少。〔……〕葡萄牙儘管已經無能為力為其語言在該地區扎根而奮鬥了，但應當透過加強其文化的地位，特別是透過其對科學研究的深入參與，透過其培訓體系的作用，尤其是發揮澳門社會中的大學的作用來鞏固自己在那裡的存在。”¹⁴

從表面上看來，葡萄牙的外交倒是跟上了這一形勢。比如，一九九零年六月六日，當時的中葡聯絡小組葡方代表團團長賈達林（Pedro Catarino）大使在東方研究中心在里斯本地理學會主辦的關於“澳門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圓桌會議上曾說道：

“如果到一九九九年十二月都還沒有葡萄牙公司有能力參與那時已經發展了的競爭的話，那麼，聯合聲明（即中葡聯合聲明）中講的關於葡萄

11. J. M. Amado da Silva和Marília Pedroso:同上。

12. 《OECD經濟研究，1994-1995：葡萄牙》，巴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95年，第125頁。

13. R. Murray Thomas和T. Neville Postlethwaite, Orgs.:《東亞的教育：變化的力量：日本、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韓國、北朝鮮、香港和澳門的官方和非官方教育》（Schooling in East Asia: Forces of Change: Formal or Non-Formal Education in Japa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uth Korea, North Korea, Hong Kong and Macau），紐約，美國，Pergamon出版社，1983年。Rafael Ávila de Azevedo:《葡萄牙文化在澳門的影響》，里斯本，葡萄牙語言文化學會，1984年；以及《作為外語的葡萄牙語國際研討會（1991年5月9日至12日）論文集》，澳門：澳門政府印刷署，1991年。

14. 澳門統計暨普查司：《澳門及珠江三角洲地區人口國際研討會（Sipomac）》，第二卷，澳門：統計暨普查司，1993年，第463頁和464頁。

牙的利益就將毫無價值。如果不積極使用我們的語言，不積極加強葡萄牙語教學，那麼，聯合聲明中講的關於保護葡萄牙語就將沒有任何意義。”¹⁵

葡萄牙在澳門缺乏這些極其重要的利益令到我們理解了、並為我們說明了澳門的過渡期為甚麼一直如此平靜；毫無疑問，這一特點在葡國管治的最後幾年中還將繼續下去。

歷史性的原因

葡萄牙在澳門的存在，從本質上講，自一九五零年至八十年代中期是一種“非正式的政治共：管”形式；從八十年代中期以來是一種“正式的共同管”形式；這種共管形式的根本前提是務實的態度和現實主義的原則¹⁶。這種雙方妥協的方式（Modus Vivendi）使大陸中國在本地的代表得以向澳門的葡萄牙政府表達中國中央政府及廣東省政府對這塊飛地上實行的各種公共政策的意見。

儘管我們不能指出這一共管開始的確切時間，但我們估計是形成於五十年代前五年。因為我們知道，當時北方的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外貿部長是於一九四九年八月成立南光公司的，該公司成立的目的名義上是為了有利於促進澳門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實質上是為了對本地區的葡萄牙行政當局施加某些影響¹⁷。雙方接觸的渠道，通過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何賢（He Xian或Ho Yin）被任命為“華人代表”而得到了加強，因為何賢那時就是當時已經很有影響力的中華總商會的會長，也是當時澳門政府委員會的委員之一¹⁸。大陸中國的代表與澳門行政當局的接觸關係非常之好。關於這點，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七年間曾擔任香港英國殖民地總督的 Alexander Grantham在其回憶錄中發表過如下的看法：

“我一向認為，澳門政府，或者說其中的任何一些人員，與中國當局的官方關係或私人交往總是比我們同中國當局的好，儘管葡萄牙當時並沒有承認北京政府，儘管那時在澳門還駐有國民黨政府的外交代表。而在香港，我們同中方則事實上沒有這種良好的關係。我想，其原因一定是盎格魯撒克遜人一方面比拉丁人更加刻板冷漠，另一方面又不如他們敏銳狡猾。”¹⁹

15. 賈達林：同上，第30頁。

16. Moisés Silva Fernandes：“澳門：中葡共管？”，溫尼伯（加拿大），1995年，（該作品尚未發表）。

17. 《南光有限公司 / 南光（集團）有限公司》，澳門：春潮出版社，（1996？）。第9頁。

18. 《澳門政府公報》，第35期，（1955年8月27日），第547頁。

19. Alexander Grantham：《透過港口：從香港到香港》（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65年，第187頁。

現在已有具體的證據表明，早在一九六三年中期，澳門總督就同大陸中國在本地的代表開始了會晤。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八日，葡萄牙同大陸中國的軍事崗哨之間發生了一次極其嚴重的意外事件，結果在澳門水域抓住了七個福摩薩／台灣的“海員”（特務）。緊接著，澳門親北京的華人社會代表便“比較經常”地要求當時的澳門總督羅必信（António Lopes dos Santos，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在這塊飛地上任職）把那“七個國民黨特務”交給大陸中國，並着手處理其它相關事宜。那位總督曾這樣回憶道：

“在意外發生之後……同何賢的談話中，我便得出結論，認為開始同柯正平（Ho Ping或 Ke Zhengping）進行接觸會很有好處，因為他當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澳門的實際代表，是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澳門的真正的貿易中心——南光公司的經理。雙方的接觸在總督官邸（Santa Sancha）開始秘密地進行。我始終認為我們雙方在三年左右的這些接觸是極其有益的；雖然是非正式的，但我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人關係。而且很顯然，我國的海外部長和薩拉查博士對這些接觸瞭如指掌。柯正平先生只是在被認為發生了嚴重的情況後或在他收到了廣東省政府的指示後才同總督進行接觸。他通常都是帶著廣東省政府外事局局長用粵語寫成的，當然是已翻譯成葡文的致‘羅必信先生’的信函而來的。在我任職期間，有三個問題——即交出國民黨的七名特務、澳門（官方）廣播電台把節目時段租給一家與福摩薩有聯繫的公司使用及福摩薩駐澳門專員公署的活動——是廣東省政府當局比較經常地提出，並通常經柯正平或何賢先生以信函的方式轉達給我的。他們來轉交信函時，總是有崔樂祺陪同，他把信件譯成葡文……”²⁰

近幾十年來，除了這些非正式的接觸外，葡萄牙當局還關照了大陸中國的許多利益。五十年代初，葡萄牙中央政府勸說美國政府減少對中國的經濟及貿易封鎖。在六十年代，葡萄牙當局於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八日同意了大陸中國關於禁止任何人在澳門進行反共活動的請求，還同意了中方關於關閉福摩薩（台灣）駐澳門專員公署的請求；該專員公署於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正式關閉。在那場令人恐怖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澳門葡萄牙當局又採取了同樣的姿態，先後關閉了幾家親福摩薩的行會，特別是關閉了親國民黨的中央工會——澳門自由工人總會，華人難民救援會，以及孫逸仙（孫中山）博物館。另一方面，當福摩薩被驅逐出聯合國組織（ONU）時，葡萄牙沒有同美利堅合眾國及其幾個傳統的盟友站在一邊，而是投票贊成共產黨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一道提出的、並獲得普遍支持的關於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那個國際組織的決議。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以後，葡萄牙關於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立場以及關於澳門地位的官方立場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九七五年一月六日，葡萄牙政府表示有興

20. 羅必信（António Adriano Faria Lopes dos Santos）：“從總督官邸的露台憶起：羅必信回憶錄”，《文化雜誌》，第16期，（1991年10-12月），第183頁。

趣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並單方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還聲明福摩薩（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舉動導致葡萄牙同台灣斷絕了外交關係。葡萄牙政府還重申“澳門地區的問題可以在兩國政府認為適當的時機通過談判解決；同時將承擔起嚴格尊重居住在那裏的公民的權利的責任”²¹。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葡萄牙的一部新憲法開始生效。這部憲法單方面改變了澳門的地位，使它由“葡萄牙管理下的”“海外省”變成為一個“地區”²²。這一新憲法，加上關於非洲地區的非殖民地化之規定導致中國政府向葡國政府倡議舉行非正式的會談，然後再舉行旨在建立雙邊外交關係的正式談判。之後不久，安東尼奧·科英布拉·馬丁斯（António Coimbra Martins）大使和韓克華（Han Kehua）大使便舉行談判，這些談判最終導致了兩國正式外交關係的建立。社會傳媒機構對最後發表的建交聯合公報進行了廣泛的報道。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在葡萄牙駐巴黎大使館簽署了關於澳門的“秘密會談紀要”。該文件的內容於一九八七年一月八日做了部分透露：

“中國大使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立場聲明如下：1）澳門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將歸還中國。有關歸還日期和歸還方式，可以在今後由兩國政府認為適當的時機通過談判解決。2）在歸還之前，澳門葡萄牙當局應當尊重和保護中國公民的合法權益。”“葡萄牙大使在巴黎聲明：葡萄牙政府原則上同意中國政府的立場。葡國政府的立場顯然是根據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四日部長會議通過的關於中國和葡萄牙之間建立外交關係的文件而採取的。在那個文件中指出：葡國憲法未把澳門納入葡國領土，認為它僅是在葡國管理之下的一個地區。葡國政府認為，結束葡萄牙對澳門地區的管理問題，可以在兩國政府認為適當的時機，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同葡萄牙通過談判解決。與此同時，葡萄牙政府承擔嚴格尊重居住在澳門的中國公民的權利的責任，葡萄牙政府還向中國政府保證，不允許任何人利用這塊在其管理下的地區來從事敵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活動。”²³

葡萄牙的政治決策者們的這一立場也在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之後在澳門建立的政治體制中體現了出來。葡萄牙領導人原計劃以全民投票選舉的方式直接選出立法會，只是由於大陸中國在這塊飛地上的代表對此提出保留，而令到後來產生的體制是混合的，因為其中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議員是直接選舉產生的，還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議員是間接選舉的，其餘議員則是由總督任命的。這一狀況一直維持到現在。過去曾在澳門法學院任過教的一位教師認為：

21. 葡萄牙外交部1975年1月6日的官方文告。

22. 《葡萄牙共和國憲法》，里斯本，國家貨幣印刷署，1976年，第18頁。

23. “部長會議主席團關於澳門的官方文告”，（1987年1月9日）全文發表在《新聞日報》上，第3頁。

“如果我們今天來勾畫澳門地區管理形式的輪廓，那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人民主權原則在這裡並沒有得以實行；它的合法性主要是歷史性的和協約性的，沒有真正的政治代表性……”²⁴

由於這樣，當八十年代中期中葡雙方開始進行關於澳門前途的談判時，與中英談判截然不同的，在談判桌上，除了確定澳門行政權的移交日期和解決國籍問題外，便沒有很多別的問題需要處理的了。而且，這兩個問題在一個比較短的時期內就得到了解決。中方同意把行政權的移交日期從一九九七年推遲到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並承諾在一九九九年後將尊重“葡國的旅行證件”。正是在這些問題上，英國人還沒有同中國談判代表達成共識。但是，正如負責進行建立外交關係談判和負責於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簽署關於澳門問題的“秘密會談紀要”的葡方代表安東尼奧·科英布拉·馬丁斯大使所說：

“這是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掌握在中國的手上。其中並沒有什麼新意。或者可以更準確地說：如果達成的協議有什麼新意的話，那就只是葡方承認澳門的命運掌握在中國的手上。本來一向就是如此。只不過中國多次表現出對澳門不關心的態度，或者說，他希望在這個問題上裝出不關心的樣子。正是由於這種對利益的複雜玩弄，澳門才得以在長達四個半世紀以來一直享有相對的自治權。我們說自治權，是因為里斯本與澳門之間的關係性質，嚴格說來，始終不是殖民地的。”²⁵

從一九四九年起，我們只是在這一共管中探測到一些“噪聲”。如一九五二年發生的邊界衝突，一九五五年取消四百周年的慶祝，以及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在這塊飛地上發生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第一次衝突發生後，葡萄牙致函美國外交部，請求美國和屬於西方政府間的負責對中國實行制裁及貿易封鎖的秘密委員會（Chicom）的大國減少這種嚴重損害共產黨中國政府利益的行動。必須指出的是，這一國際舉動，是在他們於一九五零年對朝鮮戰爭進行輕率的軍事干涉之後強加於中國頭上的²⁶。取消澳門四百周年慶祝活動的結果，是令到中國對澳門這塊飛地的外交立場變得明朗化：“澳門是葡萄牙佔領下的中國領土”，並導致禁止宗主國的政府部長來澳門進行訪問，這一禁止一直維持到一九七四年。至於在澳門發生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它是親北京的華人社會內部的深刻的制度危機的反映，其結果是導致關閉了一些親福摩薩（台灣）的行會，和重新整頓了有利於北京的派別的共管。

24. Vitalino Canas: 《政治科學序言》，澳門：法律出版社，1992年，第231 - 232頁。

25. 安東尼奧·科英布拉·馬丁斯（António Coimbra Martins）：“澳門：為何在現在？”，《日報》，（1987年4月16日），第13頁。

26.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和 Xue Litai: 《靠不住的伙伴：斯大林，毛，與朝鮮戰爭》（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斯坦福，CA，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203 - 225頁。

葡萄牙近四十六年來對澳門及大陸中國的態度和表現使我們相信，葡國領導人的這一態度和表現今後絕不會改變，因為共管一直進行得比較順利，它避免了在澳門這塊土地上發生嚴重的衝突。

政治及外交方面的考慮

最後，第三個能夠說明和解釋葡萄牙之表現的重要因素，是出於政治及外交方面的考慮。葡萄牙政治決策者們，由於看到香港回歸中國的談判過程充滿了困難，而與此同時，關於澳門問題的談判則進行得比較順利，加上他們考慮到葡萄牙在澳門的利益微薄，以及各種歷史性的原因，所以採取了一種同大陸中國當局“真誠的理解與合作”的政策，葡萄牙領導人希望使澳門的過渡進程從根本上區別於臨近的香港殖民地的過渡進程，從而保證在國際外交史冊上澳門的過渡被看成不同於香港的過渡，澳門被看成是一個不同於香港的實體。這一政策始終體現在各位葡萄牙領導人自己發表的演說中，他們總是強調葡萄牙與中國的“共同利益”，強調他們的“真誠的理解與合作”的政策。澳門總督韋奇立於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就職時對這一政策的總原則做了切實的闡述。這位澳門的葡萄牙行政長官說：

“正因為澳門葡國政府所擁有的時間已經很少，所以，我的政策方針的一貫目標將是要防止在過渡期中出現緊張局勢和不穩定的局面，從而加強保持連續性的可能性和條件，因為這些要求已載入了中葡聯合聲明，並且在未來的基本法中也還必定會被重提和強調。……亦正因為保障澳門享有一個穩定的、可行的和連續性不被中斷的未來是我們應盡的義務，所以，我將竭盡全力保持葡萄牙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現存的和諧關係，闡明我們的目標，解釋我們所採取的決策的目的和在我們的原則和實踐中確定我們的歷史存在的合法性。”²⁷（斜體是我們加的）

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六年間任葡國總統的馬里奧·蘇亞雷斯(Mário Soares)本人在一九九四年四月出版的《演說集8》第八卷的前言中說，“葡萄牙對中國當局採取的真誠的理解與合作的戰略看來已取得了有益的成果。我們希望這一戰略能繼續堅持下去……”²⁸

這一政策從各方面給予了中國政府巨大的支持：如在中國擺脫國際的孤立方面，在中國重新融入國際社會方面，在它免受對其人權狀況的直接的或間接的、公開的或含沙射影的批評方面，以及在雙方共同努力推動澳門加入國際專業組織機構方面。

甚至在敏感的政治及外交形勢方面，比如在天安門屠殺事件發生之後國際上對中國的孤立期間，葡萄牙領導人仍繼續執行同北京“真誠的理解與合作”的政策。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僅幾個月，當全中國範圍內都還在猛烈地席卷着肆無忌憚地逮捕和殘酷迫害中國民主運動領導人及其支持者的浪潮的時候，文禮治(Carlos Melancia)總

27. 韋奇立(Rocha Vieira)將軍：“設計澳門的未來”，《澳門》，第一部分，第35期，（1991年5月），第12-13頁。

28. 蘇亞雷斯(Mário Soares)：《演說集(8)》，里斯本，國家貨幣印刷署，1994年，第41頁。

督就對中國進行了正式訪問，他是西方世界在中國政權受到嚴重孤立的時刻到北京去訪問的首批政界人物之一。而且，這次訪問沒有反映澳門華人的真正意願及其政治精神，因為他們對中國民主運動表示了堅決的支持，他們通過參加一九八九年五、六月間這塊土地上舉行的空前規模的公眾游行來表達了對中國當局的不滿。

葡萄牙當局支持中國政權擺脫國際孤立的舉動還表現在當時的歐洲共同體內部。在一本官方出版的著作中有如下記載：

“根據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所採取的強烈譴責中國當局實行鎮壓的措施，十二個成員國同北京所有的雙邊部長級和高層的接觸都中止了。然而，葡萄牙在獲得伙伴們的同意後，透過為關注與澳門地區相關的問題而建立起來的常設機構，首先恢復了同中國的高層的接觸。”²⁹

天安門事件發生一年後，當時的中葡聯絡小組葡方代表團團長賈達林（Pedro Catarino）大使承認：

“葡萄牙政府由於始終意識到了這種相互依賴性，所以對中國一直持積極態度，在歐洲經濟共同體內一貫起著緩衝劑的作用；而且這種作用還將繼續起下去。”³⁰

葡萄牙的這種態度，在前任總理施華高（Cavaco Silva）於一九九四年訪問中國之後，又進一步得到了加強。葡萄牙政府首腦主張歐洲聯盟解除對中國的制裁。這一主張引起了葡萄牙天主教社會參與運動的注意³¹。

然而葡萄牙對中國的支持，在其他方面，比如在中國政府重新回到國際社會方面，也體現了出來。這樣，中國領導人終於得以實現了對里斯本的訪問。這些訪問以及中國領導人對其他國家的訪問，促進了中國重新登上國際政治舞台。於是在一九九二年二月，正當葡萄牙擔任歐洲聯盟主席時，中國總理李鵬對里斯本進行了訪問。這次訪問受到葡萄牙新聞界及歐洲新聞界的批評。儘管這樣，李鵬的這次訪問成了中國政府擺脫國際孤立的起點。隨後，國家副主席榮毅仁在一九九三年九月也對里斯本進行了訪問；兩個月之後，國家主席江澤民又對里斯本進行了訪問。這些訪問都達到了同樣的目的。

葡萄牙當局總是竭盡全力避免同北京發生意外的政治磨擦，所以葡萄牙歷屆政府都對中國違反人權和對中國的少數民族問題保持絕對的沉默。不過，葡萄牙的這一態度既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對。親北京的華人支持葡萄牙的這一態度，他們高度讚賞它，並把它同其他對中國政權一向執行一條不如葡萄牙靈活的路線的歐洲國家所持的態度加以對比。所以，當葡萄牙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某些社會傳媒機

29. 外交部：《葡萄牙在歐洲共同體中：第四年——1989年》，里斯本，歐洲一體化國務秘書處，1990年，第362頁。

30. 賈達林：同上，第31頁。

31. Mário Robalo：“憤怒的天主教徒”，《快報》，（1994年4月23日），第5頁。

構和天主教社會參與運動，以及那些希望自己國家的政府尊重人權憲章的華人尖銳地批評並注意到葡萄牙當局所持的兩種不同的態度和所採取的兩種不同的措施時，葡萄牙當局照樣堅持只批評和揭露印度尼西亞對東帝汶的粗暴佔領，而對中國對西藏的同樣粗暴的佔領和對最基本的人權的踐踏卻視而不見。

葡萄牙這一政策的另一結果，是導致中葡兩國共同努力推動澳門加入一些國際專業組織；這樣做，中方的目的是希望可以象徵性地強調澳門不同於香港，而葡方和那些對中國政府的意圖感到放心的華人社會團體則是為了能在一九九九年之後獲得相對於中國的一定的“自治權”。儘管從過渡期開始到一九九五年，澳門在獲得了中葡聯絡小組的相應的同意後，已經加入了二十四個國際組織，但是，還不能期待從這些加入中得到巨大的政治回報，因為這些組織都基本上是技術性的和非政治性的。加入這些組織只不過是中方的一個象徵性的行動，是中方對澳門地區一九九九年後將享有的相對的自治權的承認。中國中央政府擁有兩個遏制任何過分自治企圖的文件：中國的憲法和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該基本法聲明對外政策由中央政府負責；以及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所享有的否決權。

由於澳門回歸中國的進程一直都非常平穩，而與此同時，香港和福摩薩的過渡則障礙重重，所以中國的各個領導人總是說澳門應當成為福摩薩和香港所效法的榜樣。但是，我們認為，實際上這兩個地區是不會步澳門的後塵的，因為葡萄牙在澳門和珠江地區的利益甚微，而英國在香港和珠江地區卻有着巨大的商業利益、經濟利益及金融利益；至於福摩薩（台灣）人民的願望則主要是想獲得相對於北京政權的更大的自治權。

結 論

上述這些考慮和所闡述的理由使我們理解了澳門政治過渡進程及其在珠江地區的區域一體化進程為何一直這麼平穩的原因，也使我們部分地理解了葡萄牙過去在這塊飛地上的許多領導人為何總是持溫順的觀點。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一年間曾擔任過澳門政府政務司和護督的范禮保（Murteira Nabo）曾這樣講過：

“在如上所述的文化、社會及經濟領域方面，人們可以輕易地預見到，如果葡萄牙不透過澳門同中國有條不紊地和系統地建立起牢固的文化關係，特別是經濟及貿易關係，那麼，不管你願意與否，在一九九九年後的三代人或四代人之後，葡萄牙在澳門留下的紀念就將所剩無幾。”³²

考慮到上述制約葡萄牙的態度和表現的三個因素，我們可以預言澳門過渡期的最後幾年仍將會是高度平靜的。葡萄牙政治決策者們關心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從澳門“體面地”離開，也就是說，在過渡期內要做到同中方盡可能不發生磨擦和爭執。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他們將達到自己的目的，當然，除非大陸中國在這期間陷入一場令澳門回歸中國的進程和時間表變得完全不可能實現的深刻的內部政治危機。

32. 范禮保（Murteira Nabo）：“我們在亞洲的三角關係（II）”，《經濟快報》，（1995年12月1日），第15頁。

